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

张 斌 尹 鑫

摘 要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成型期三个主要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本质属性、对象与范围、方法等方面,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国情见证、文明印记、话语依托四个方面。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传承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中国特色,着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档案价值论,发展面向中国本土的档案学支柱理论,构建面向人文复兴的数字人文理论,构建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档案信息理论,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参考文献39。

关键词 档案学 基础理论 理论体系 历史发展 理论构建

分类号 G270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Bin & YIN Xi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theory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jor periods: initial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and formation stage. It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and sco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thods.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1)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 the testimony of national conditions; 3) the mark of civilization; 4) the dependence of discourse.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special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No. 19VXK09) which is one of the proje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尹鑫,Email:yinxin@ruc.edu.cn,ORCID:0000-0003-1450-6726(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IN Xin, Email:yinxin@ruc.edu.cn. ORCID:0000-0003-1450-6726)

further develop and inheri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The task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ival valu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cing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a pillar theory suited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humanism theory fo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ive inform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e Party's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ival management the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39 refs.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Fundamental the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0 引言

我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样可上溯数千年前。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在吴宝康等几代档案学家的努力下,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和发展档案学科,并逐步将实践经验升华为学科基础理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档案学的根本性与普遍性问题,包括档案的定义、本质、种类、作用、价值、运动规律,档案管理的宏观理论问题,以及档案管理的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历史发展进程等^[1]。档案学基础理论对档案学的社会价值具有理论阐释力,并促进档案学价值形态由“内隐”向“外显”转化^[2]。

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本质属性、对象与范围、方法等方面。本质属性包括原始记录性、价值属性、法治属性、文化属性。对象与范围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档案价值论、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三大基本理论为主;以档案学基本问题为依托;以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方法特征表现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在基础理论建设中的应用。

本文以吴宝康教授对于档案学理论的界定和分类方法^[3]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分类的

主要依据,通过梳理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现实基础,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契机,在当代语境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1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

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4]根据恩格斯的“理论思维是历史产物”的观点,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重要时间节点的掌握也应以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重大事件为基本线索。本文结合中国档案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根据范式分期法,统筹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档案论、档案学科论、档案事业管理论、档案工作论,将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型期。

1.1 初创期(1949—1977年)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档案学基础理论也开始萌芽并成长,主要表现为:明确了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原则;明确了中国档案学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明确了创建档案学的根本宗旨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建

设服务;明确了档案的本质属性为历史纪录性;初步建立了档案学概念体系、研究对象体系、基本原则体系等,完成了档案学建设从被动学习国外到主动发展自身特色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以吴宝康教授为代表的几代档案学家,在旧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超越了旧档案学仅研究档案工作中的整理与编目问题的局限,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不仅改变了旧中国档案学理论贫乏的面貌,也逐步将国外档案学理论中国化,并同时进行创新和突破。

(1) 概念体系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主要为适应和服务于当时亟待建立和发展的档案事业,档案学概念体系也体现了对档案工作现象及规律的高度关注。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印《档案学概论讲义(初稿)》,将档案学界定为“反映档案工作实践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5]。界定和阐释了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是描述了档案的形成过程,并对档案的定义进行界定;二是阐释了集中统一管理、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等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三是界定了档案的“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等档案分类概念;四是界定了档案学的概念,并阐释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基本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写的《档案管理学》在1960年版《档案学概论讲义(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档案”“国家全部档案”“全宗”“分类”“编目”等概念作出界定,将档案界定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工作和生产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按照一定归档制度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

(2) 研究对象体系的初步建立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体系开始初步建立。档案学被列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档案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需要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1960年,《档案

学概论讲义(初稿)》初步建立了包括档案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研究任务等基本要素在内的研究对象体系,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档案的科学定义、种类、划分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二是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文件编辑公布等原则和方法;三是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和组织、行政管理、业务指导和档案干部培养等工作理论;四是档案学的科学性、党性、实践性、技术性,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五是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同时,明确档案学的研究任务为:认识、研究、揭示档案客观实践的规律,以便于根据规律指导档案工作实践。

(3) 基本原则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档案学主要以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为党管档、保守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机密等成为这一时期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党的档案工作方针政策为依据”这一基本原则成为新旧档案学区分的重要标志。1959年,随着中央档案馆的正式建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确立了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原则与体制,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法律形式进一步明确,这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基石。

1.2 发展期(1978—1996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带来了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与此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创新与突破主要表现为:档案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档案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提升,档案学理论的国际化进程开启。

(1) 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学科体系的设计和研发达到了新高度,突出表现为吴宝康教授根据中国国情,设计了以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为主体,包含“档案学理论”“档案学史”“档案事业史”“档案法学”“档案术语学”

“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学”“档案技术应用学”等分支学科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丰富了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内容,也展现了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的主干和分支。

(2) 档案学理论的科学化程度提升

档案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和发展。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对“档案学”“档案学人物”“档案管理”等名词条目作出了系统梳理;1994年出版的中型档案学专门工具书《档案学词典》较之《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增加了国外档案学基本术语、档案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等专业名词条目,进一步发展了档案学术语理论,促进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这一时期,档案学概念体系、知识体系、专业体系、教材体系、实验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高等教育机构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不断发展,档案学也发展成为由“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文书学”“中国档案事业史”等多门特色科目组成的独立学科,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崭新的学科体系,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科学化程度的提升。

(3) 档案学理论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开启

伴随着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第二次革命,在开放思想的指引下,档案学理论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开启。正如冯惠玲教授所评价:“改革开放大势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大动力,我国档案学科的二次创业幸运地与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同步。”^[6]自1978年起,档案学界在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和环境开始大量引介、学习、转化国外档案学成果。1978年,外国档案学领域著名学者韩玉梅将国际档案理事会概念引入中国,向中国档案学界介绍了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任务、组织及其主要活动,梳理了外国档案鉴定工作的起源和发展历程。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召开,中国档案学开始走向世界、走向开放^[7],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开展档案领域外事活

动等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展示了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成就^[8]。

1.3 成型期(1997年至今)

1997年以来,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和成熟,主要表现为:创立适应数字时代的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丰富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价值论;发展了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两大档案学支柱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引初步形成了档案法学理论;建立了适应数字时代的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档案信息理论;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

(1) 中国特色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创立

1997年,冯惠玲教授的博士论文从“认识电子文件”“电子文件的原始性与证据性”“无纸收藏”“双重鉴定”“长期保存”“电子文件是流动的资源”“再次关注来源原则”“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八个方面阐释了电子文件带来的记录革命^[9],奠定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基础。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促成了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出台,2009年《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冯惠玲教授总结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特点是统揽全国、政策引导、融合发展、综合治理^[10]。

(2) 中国特色档案价值论的丰富与发展

档案价值论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档案价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工具价值论”——“双重价值论”——“主客体价值论”三个发展阶段。古代档案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政治威慑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价值,档案或被封存于“石室金匱”中,或被消极焚毁。近代以来,在重视“旧档”信息价值的基础上,确立了“二元价值观”^[11]。20世纪80年代引入双重价值论,为中国档案学三大基础理论之一——价值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99年张斌的博士论文《档案价值论》,以档案价值现象、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12],是系统阐释档案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档案价值

论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档案价值鉴定中,2002年,张斌将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标准概括为年龄、来源、职能、双重价值、宏观职能、效益、相对价值、比例控制八个方面^[13]。

(3) 中国对档案学支柱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发展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发端于欧美档案学者对文件和文件中心的理论阐释。文件是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重要标志^[14]。

20世纪90年代,国际档案学思想在经历了“连续体意识萌芽—连续体术语流行—连续体思想建立”三个发展历程后^[15],澳大利亚档案学者弗兰克·厄普沃德提出文件连续体理论^[16],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件连续体模式,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加以发展^[17]。我国档案学者从文件运动的阶段性、特殊形式、标准化等方面发展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揭示了从文件到档案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二是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从“历史档案”扩展为“现代文件”;三是将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从简单、静止的方法改进为系统、动态的方法。

其次,中国学者发展了来源原则,建立了中国特色全宗理论。来源原则是由事由原则发展而来的,是国际档案学界公认的档案整理核心理论。来源原则划清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体现并维护了档案的本质属性,确立了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被认为是档案学中最具学科特色并具有核心地位的基础理论。来源原则的确立是档案学真正形成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引入了来源原则,继承和发展了《荷兰手册》以来源原则为核心的全宗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全宗理论;提出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明确了档案的国家所有权;在对全宗理论的反思^[18]中,对国家档案全宗理论进行了以来源和体系为核心的丰富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结合电子文件的时代背景,对传统全宗理论的稳定性、必要性、独立性进行了再认可,并实现了全宗从传统意义上

的“档案馆藏单位”提升至“档案组织和运动的基本单位”^[19]的理论发展。

根据技术环境的发展变迁,来源原则在电子文件出现后被中国档案学理论界重新讨论,出现了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新来源观。新来源观的确立,使来源原则在电子文件时代依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子文件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来源被“重新发现”。较之国外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难题、重新发现来源原则的目的,中国档案学界根据档案管理的具体实践,对来源原则进行重新阐释,拓宽了来源原则的内涵。与此同时,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为代表的西方档案界提出,文件和档案管理进入“后保管时代”,并提出“后保管模式”。我国冯惠玲^[20]、何嘉荪^[21]等学者对西方档案界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及其理论基础——“文件构成要素论”进行了阐释和发展,提出“后保管模式”是“以来源为中心的管理”,从而区别于以实体为中心的“保管模式”,扩大了来源原则的理论范畴。

(4) 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

一是档案学元理论初步成型。档案学元理论是对档案和档案学本身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主要研究档案的来源、内涵、概念、种类,档案学的形成、性质、特点、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相近学科的关系,档案学与文化、历史的联系,档案工作规律、原则,档案法、档案管理制度和标准等。研究元理论使档案学得以正视和反思学科的本元。2019年,潘连根将档案学元理论体系提炼归纳为包括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体系、范式等在内的十二个基本组成部分^[22],进一步提升了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层次。

二是档案术语学理论进一步发展。术语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基础。一方面,档案学术术语侧重术语内涵,主要揭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这一最本质属性。随着档案管理由实体管理向信息管理、数据管理和知识管理发展,数据、知识、信息等术语大量涌入档案术语范畴。

另一方面,档案法规术语侧重外延,着重揭示术语的适用范围,保障术语适用的稳定性。在成型期,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进一步发展了档案学的学术术语和法规术语理论,明确了档案术语学理论包含档案的定义、本质、范围、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和区别等内容。

三是档案学史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在成型期,档案学史理论在前期中国档案事业史发展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对档案学史理论的价值、构成、内容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档案学史理论为基础,包含档案保护史理论、科技档案史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史理论、文书史理论等分支在内的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结合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与数字史学理论相结合,发展了数字档案学史理论。如梁继红等学者在前期古文献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史知识库研究的基础上,将档案学史研究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在档案文献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整理、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传承等方面对中国档案学史理论作出进一步发展。

四是档案法学理论初步成型。档案法学理论是将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融入档案学顶层规范研究领域,通过结合档案学理论与法学理论,发挥档案学在参与国家治理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作用。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档案法》,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依法治档阶段。1996年修订《档案法》,对档案行政执法权作出明确规定。到1997年,我国先后批准、制定、颁布了239项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全面实行依法治档战略,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法规体系得到进一步充实与完善^[23]。

新时代档案法学理论的发展逐步突破了仅研究档案规范设计的局限,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引下,向更具全局思维和宏大语境的档案治理理论发展。档案法学理论在参与档案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过程保障、实施完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并与档案管理实践相结合,不断补益、调整和提升理论水平。2020年,新《档案法》通过,档案治理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以档案法学为基础,以档案法立法研究新知识体系为依托^[24],以信息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网络法学、大数据法学研究为发展方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法学理论体系。

五是档案信息理论正式形成。我国档案信息理论围绕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三态两化”等逐步发展成型。2005年,随着《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发布,风险管理理论被引入电子文件管理领域,档案信息的数字化理论、数字档案馆理论、数字鸿沟理论等与数字化趋势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010年,国家档案局发布《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论、服务体系理论研究逐步升温。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7年“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研究获得国家社科立项,推进档案领域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面对组织结构、开发模式、管理环节等方面的挑战,档案事业理论研究领域提出构建“双众”循环开发圈、引导公众参与档案数据管理、提供档案创意定制服务等学术观点^[25]。2018年,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从双轨制到单轨制的转型,档案学领域提出“模拟态”“数字态”“数据态”的三态理论和“数字化”“数据化”两化理论,三态两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档案信息理论的正式形成。

六是数字人文理论与档案学理论初步融合。数字人文理论与档案学理论密切关联,同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挖掘档案价值”“以历史赋能未来”“促进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融合发展”等发展愿景具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实践领域,冯惠玲教授团队通过开展“北京记忆”“浙江台州高迁古村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文化大数据背景下古村落多元异构档案的知识融合研究”等纵横向项目研究,推进数字人文融入档案学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以及机构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等方面。

2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理念

2.1 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是处于首要地位的构建理念。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和发展继承了党自革命时期形成和保留的理论经验,包括: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以党的方针政策为纲整理档案,档案工作姓党^[26],为党管档,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党史记忆保存保管战略化,注重保守党的重要档案机密;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具有亲民档案观、群众档案观等。

2.2 国情见证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等真实的历史进程,围绕档案学“为国守史”的基本理念,为国家各项事业建设提供资政辅助和原始参考依据。通过档案记录的历史凭证,如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国家重要事件的照片档案见证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建设情况;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的手稿档案和音视频档案见证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历程;非典防疫档案为新冠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等等。档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为研究国情发展提供了原始依据。

2.3 文明印记

档案是记录与传承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发展脉络的文明印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明印记使档案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记录。自商朝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在悠久的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商

朝甲骨档案记录了中国最早的官府文书;西周金文档案印证了中国早期文字及篆刻文化的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最早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尚书》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利用档案修史的先河;秦代确立的文书档案“书同文”制度具有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两汉文书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档案的政务利用、文化利用、学术利用;魏晋南北朝建立了健全的文书体式;唐朝首创公文改错的“贴黄”制度;宋朝建立了最早的皇帝档案库;元朝建立的区别文字架阁库制度丰富了多民族档案统筹管理的实践;明朝档案库达到历史高峰;清朝文书制度出现上奏文书等新的文书种类以及功用命名档案、满文译音档案、地名命名档案等数百种档案,一案一卷制度、编目登记制度等档案管理制度也发展至历史新高峰;民国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促进了近现代档案学的萌芽和发展。档案文献遗产是文明孕育与形成的真实记录,是跨文明对话的历史凭据。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促进文明互鉴”的学科使命。

2.4 话语依托

(1) 历史话语

在中国五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档案事业。自古以来形成的档案载体形式、档案保护工艺、档案管理制度,以及体现历朝特色的档案馆库建筑,都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历史话语的体现。甲骨文档案、金文档案、舆图档案、皇帝诏书档案与实录档案等,记载和传承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的发展史;传统档案制成材料和载体材料的传承保护,延续着中国历史发展的珍贵成果;两汉兰台、唐代甲库、宋代架阁库、明代内阁大库、明清皇史宬等古代档案库建筑的建立,体现了中国历代治理特色和古代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通过中国档案学历史传统话语的依托,有助于讲好中国档案学故事,传播中国档案界声音。

(2) 现代话语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价值指引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现代话语逐渐丰富、立体、多元。主要体现在: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档案机构;培养了数量最多的档案干部;发展了具有特色的档案学教育和档案事业;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价值论、全宗理论和分类理论;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体系;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档案保护学科、中国档案史学科、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等;发展了数字人文、计算档案学等前沿领域。现代档案学理论在人文积淀、信息化转型、依法治理、融合发展等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3) 国际话语

中国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古老悠久的档案历史、丰富的档案资源、无穷的档案学智慧、睿智的档案学者群体等,作为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都向国际档案学界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1996年,中国作为首个主办国际档案大会的亚洲国家,在北京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这是国际话语的突出体现。会议探讨的以“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为核心的国际档案合作模式,“促进档案发展的北南合作和南南合作”,以及对于火灾、水灾、放射性污染等特殊情况下抢救特定国家档案和保管国际组织档案的国际合作等,都体现了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在国际档案理论界的显示度、参与度和贡献度。再如,侨批档案作为典型的民间档案,是海外华侨华人向国内亲眷传寄书信的重要记录,记录了中国国际移民迁徙、创业、发展的历程,记录了闽籍华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史实^[27],是中华文化与国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话语依托,也是中国档案学国际话语的重要体现。

3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迎来“十四

五”开局之年。当前,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建设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新《档案法》正式实施、建党100周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等重要机遇,都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提供了指向。中国档案学应围绕把握时代需求、拓展学科边界、促进交叉融合、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发展和传承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中国特色。具体包括着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档案价值论,发展面向本土的档案学支柱理论,构建面向人文复兴的数字人文理论,构建面向数据时代的档案信息理论,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构建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

3.1 构建面向新时代的档案价值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价值论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

(1) 进一步彰显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政治价值

中国特色档案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在档案学领域的具体化。档案学基础理论构建的政治价值在于:一是可以助力新时代治国理政;二是可以促进红色档案理论研究和价值开发;三是可以促进两岸档案学学术融合,加快伟大复兴的学术心理融合进程;四是可以促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档案学学术融合和少数民族繁荣稳定;五是有助于弘扬档案学学术文化中的亲民观思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与加强两岸人文交流已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两岸档案学学术融合,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档案政治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2) 进一步传承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化价值

中国特色档案学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托。传承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化价值,需

要加强中国档案史理论建设和档案保护理论建设;同时,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促进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民族学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融合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可以进一步开发中国民俗实物档案的文化价值,如中国丝绸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苏州宋锦、四川蜀锦、南京云锦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档案学可以整合以苏州丝绸档案馆为代表的特色档案馆馆藏资源,开展特色理论研究;二是可以进一步开发中国语言文字档案的文化价值,关注古诗、古词、古赋等文字档案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关联;三是进一步开发中国民间艺术档案的文化价值,如可以关注民间戏曲档案的整体研究;四是进一步开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文化价值,以基础理论研究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与传承。

3.2 发展面向中国本土的档案学支柱理论

2010年,冯惠玲教授在对“十一五”时期档案学科发展状况调研后,认为“中国风格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尚需发展”^[28]。在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之国外,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在我国本土的发展和突破都比较有限。外国档案学领域著名学者黄霄羽曾提出:“我国档案界始终未能树立全宗原则在档案学理论乃至整个档案专业的支柱地位。”^[29]同时,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支撑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实现范式构建方面面临质疑。如孙大东认为,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合作为科学成熟标志的范式规定,不能作为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范式。档案学基础理论,需要加强档案学支柱理论建设和支柱理论的范式化建设。面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为基础架构的新一代人类信息环境^[30],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亟需进行当代构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进程中继续承担理论使命、彰显理论作为,发展面向中国本土的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3.3 构建面向人文复兴的数字人文理论

数字人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史前—当下”的整个人类历史记录。20世纪90年代末,可视化、地理空间展示、模拟空间、复杂系统的网络分析等数字化技术开始被应用到文化遗产的获取和利用中,探索文化遗产中的人文价值以及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31]。

历史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依托。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将档案学的优势与人文学科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构建面向人文复兴的中国特色数字人文理论,在数字人文趋势和人文数字化趋势下,积极应用数据驱动技术、知识发现模型、可视化技术等,产出档案学领域的数字人文成果。同时,凝聚数字人文的学术力量,传承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3.4 构建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档案信息理论

我国档案事业“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档案信息化进程”,“十一五”规划又将档案信息化作为总体目标的主要任务。2035年远景目标包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等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档案信息理论是档案学理论研究领域参与现代化建设、关键核心技术建设、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信息库的建立和充实,关注信息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使用,整合档案信息资源与国家基础信息资源数据库,解决档案信息和电子档案的长期保存问题。

钱毅教授“三态两化”理论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档案信息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早期档案管理理论、档案数据库设计理论、档案数据库规范理论、电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数据库生命周期理论、分布式数据库理论、数据仓库理论、档案数据库质量控制理论在数据时代的延伸和发展。2007年,钱毅进一步提出将全

宗原则和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应用于档案数据库设计,能有效保证档案数据库内部的有机联系^[32]。

中国特色档案信息理论的当代构建,在理论层面,应进一步深化研究“三态两化”理论和数字档案馆学理论原理^[33],进一步发展涵盖事由原则、来源原则、全宗原则的档案有机联系理论,以及涵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文件运动理论、档案价值理论。在实践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档案馆和智慧档案馆建设,如在科技档案文献的长期保存领域,我国已提前布局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理论研究,初步建成的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系统,已经能够实现稳定保存国内外 68 家出版社的主要科技文献^[34];再如在历史档案开发领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研究竞赛、众包、众赛等形式,促进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使历史档案积极转换为历史大数据,并为中国特色档案信息理论奠定实践基础。

3.5 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

法治国家建设是新时代的重要国家战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可以围绕进一步加强档案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建设、提升中国档案治理规则体系的国际话语权、构建面向证据时代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电子档案理论等方面展开。

(1) 进一步加强档案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建设

档案法治的基础是《档案法》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档案法律与制度体系。首先,可以进一步加强档案治理理论研究。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并将其置于包括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安全体系在内的四大体系之首。国

家档案局进一步提出健全档案管理体制机制、完善档案法规制度、健全档案标准规范等具体方略^[35]。一方面,应以《档案法》为基础,构建涵盖政务档案资源大数据治理、企事业档案资源平台治理、民间档案资源多中心治理在内的档案资源整体治理体系,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治理机制,进而促进新时代我国档案资源治理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在《档案法》正式实施的背景下,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办法》”)的修订理论作进一步研究。《档案法实施办法》修订理论的已有探索主要围绕具化新《档案法》的部分法定定义及例外条款、建立专门组织机构及其常设机构^[36]等方面展开,未来可以在效力细则、信息化细则、法律责任细则、保管保护细则研究等方面继续推进。

其次,可以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理论建设。我国北宋时期即有体现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体系,如具有中间性档案馆性质的六部架阁库,档案管理体系的当代构建可以在延续和借鉴中国古代优秀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加强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国家档案战略备份中心,但由于存在从双套制向单套制保管转换的制度困境,同时在档案实务中实现“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管理细则仍不十分明确,因而需要加强相关管理理论建设。

(2) 提升中国档案治理规则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域外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我国现行法在域外适用规则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防御性色彩浓厚,主动性略显不足^[38]。我国档案治理规则的构建,首先要加强外国档案学史理论和外国档案法学理论研究,为提升我国档案治理规则体系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参考。其次,因为《档案法》是我国整体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适当赋予以《档案法》为代表的档案治理规则体系一定的域

外效力,并进行适度域外适用,提升中国档案治理规则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3) 构建面向证据时代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电子档案理论

早在 2009 年,钱毅教授就提出了“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为档案数据的未来发展提供营养”的观点。随着新《档案法》第 37 条对电子档案的证据效力的认定,即明确规定“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我国法学界逐步关注到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证据效力问题,提出针对电子文件证据规则体系的细则补位的新思路^[39]。以此为契机,提升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电子档案理论对智慧司法创新的理论映射能力,以及对我国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力、融合度和延展力;促进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电子档案理论与

档案鉴定理论的融合研究,促进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证据化利用。

4 结语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需要衔接过去与未来。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也需要立足中国,传承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提升理论贡献力;需要根据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构建新理论;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档案学智慧。

参考文献

- [1] 冯惠玲,张辑哲. 档案学概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6. (Feng H L, Zhang J Z.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science(the second version)[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6:236.)
- [2] 闫静. 1949—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8. (Yan J. C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archives in China, 1949 – 1966 [D].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8.)
- [3] 吴宝康. 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J]. 湖南档案,1986(5):6–9. (Wu B K. Archives science and its discipline-system[J]. Hunan Archives, 1986(5):6–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5. (Marx K, Engels F. Marx and Engles anthology(the third volume)[M]. Beijing:People's Press,1995:465.)
- [5]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教研室. 档案学概论讲义(初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1960. (Depart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ndout on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first draft)[M]. Beijing:Internal Materials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960.)
- [6] 冯惠玲.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J]. 档案学通讯,2018(6):4–9. (Feng H L. The historic leap of China's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40 years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up[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18(6):4–9.)
- [7] 冯惠玲. 走向世界的中国档案学——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J]. 档案学通讯,2000(5):14–16. (Feng H L. Chinese archives going to the world;the influence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Ar-

- chives Conference on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es archive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0(5):14-16.)
- [8] 孙钢. 盛况空前 硕果累累——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主要成果[J]. 档案学通讯,1996(5):4-6.
(Sun G. The 13th International Archives Congress and its main achievements;an unprecedentedly grand occasion
and achieve great succes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96(5):4-6.)
- [9] 冯惠玲. 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7. (Feng H L. Having new memorie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research[D].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997.)
- [10] 冯惠玲. 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特点[J]. 档案学通讯,2009(5):9-12. (Feng H L.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strategy of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in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9(5):9-12.)
- [11] 覃兆判. 从一元价值观到二元价值观——近代档案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影响[J]. 档案学通讯,2003(2):
10-14. (Qin Z G. The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modern times archival values;from unitary values to dual values
[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3(2):10-14.)
- [12] 张斌. 档案价值论[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9. (Zhang B. Archival value research[D].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999.)
- [13] 张斌.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七)——鉴定活动论:鉴定标准与价值判断[J]. 档案学通讯,
2002(1):22-26. (Zhang B.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chival value appraisal(the seventh):
the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activity;appraisal criteria and value judgment[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2
(1):22-26.)
- [14] 何嘉荪.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对我们的启示[J]. 档案学通讯,1991(6):7-10. (He J S. The theory of file's
life cycl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u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91(6):7-10.)
- [15] Mckemmish S, Piggot M. Reviews of the records continuum:Ian Maclean and Australian archives first fifty years
[M]. Sydney:Ancora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Archives,1994:52-55.
- [16] Upwad F. Structuing the record continuum part one:post;custodial principles and properties[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1996,24(2):268-285.
- [17] 黄世喆. 关于科技档案本体论若干问题的探讨(之二)——从科技档案的特点看档案学支柱理论的适用性
[J]. 档案管理,2008(5):11-17. (Huang S Z. 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of ontology of sci-tech archives
(the second):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of archival pillar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tech archives[J]. Ar-
chives Management,2008(5):11-17.)
- [18] 冯惠玲,何嘉荪. 对全宗理论的反思——全宗理论新探之一[J]. 档案学通讯,1988(4):7-11. (Feng H L,
He J S. The reflections on Fond Theory;the new research on Fond Theory(the first)[J]. Archives Science Bulle-
tin,1988(4):7-11.)
- [19] 何嘉荪. 论全宗形态的异化——电子文件时代还有全宗吗?[J]. 档案学通讯,1998(2):18-20. (He J S.
The research on the abnormal form of fond;is there still fond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documents[J]. Archives Sci-
ence Bulletin,1998(2):18-20.)
- [20] 冯惠玲. 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摘要之六[J]. 档案学通讯,1988(6):

- 45-49. (Feng H L. New thinking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Having New Memorie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sixth summary[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1988(6): 45-49.)
- [21] 何嘉荪, 史习人, 章燕华. 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简评文件构成要素论[J]. 档案学研究, 2010(1): 4-8. (He J S, Shi X R, Zhang Y H. 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in post-custodial era: brief comment on the document constitution element theory[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0(1): 4-8.)
- [22] 潘连根. 档案学元理论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9-253. (Pan L G. Research on the meta-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9-253.)
- [23] 王乃迎. 档案立法和法制建设取得突出成就[N]. 中国档案报, 2002-10-28. (Wang N 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archival legislation and legal construction[N]. China Archives New, 2002-10-28.)
- [24] 陈忠海, 等. 档案法立法研究[M]. 上海: 上海兴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2. (Chen Z H, et al. Legislative research on archival law[M]. Shanghai: Shanghai Xingjie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
- [25] 王协舟, 王露露. “互联网+”时代档案工作改革的几点思考[J]. 档案学通讯, 2016(5): 94-100. (Wang X Z, Wang L L. Some thoughts on archival work reform in “Internet+” er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6(5): 94-100.)
- [26] 冯剑波.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牢记“档案工作姓党”[N]. 中国档案报, 2018-08-17. (003) (Feng J B.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Party is the name of archival work”[N]. China Archives News, 2018-08-17(003).)
- [27] 国家档案局, 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 福建省档案馆. 丝绸之路文献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45-51.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East Asia Regional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Fujian Provincial Archives.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Silk Road Document Heritage[M]. Beijing: Renming Press, 2020: 45-51.)
- [28] 冯惠玲, 周毅. 关于“十一五”档案学科发展的调查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若干设想[J]. 档案学研究, 2010(5): 4-10. (Feng H L, Zhou Y.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discipline in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and some ideas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0(5): 4-10.)
- [29] 黄霄羽.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3. (Huang X Y. Holding to history creed: gener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 pillars of western archival theor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
- [30] 王琳, 赖茂生. 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回顾与展望: 基于情报学理论的视角[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4): 28-47. (Wang L, Lai M S.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ie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4): 28-47.)
- [31] Burdick A, Drucker J, Luneneld P, et al.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M]. 马林青, 韩若画,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 (Burdick A, Drucker J, Lunenfeld P et al. Digital humanity change the rule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sharing[M]. Ma L Q, Han R H,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 Press,2018;2.)
- [32] 钱毅. 档案数据库的规范和质量控制[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07. (Qian Y. The regul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n archival database[D].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07.)
- [33] 王芳. 数字档案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21. (Wang F. Digital archival science[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15-21.)
- [34] 陆成宽. 本土长期保存我国有了国外数字科技文献“备份”[N]. 科技日报,2021-10-22(003). (Lu C K. Indigenous long-term preservation China has foreign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backup”[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2021-10-22(003).)
- [35] 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 强基固本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N]. 中国档案报,2021-08-26(001). (The Policy Laws and Regulation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basis and reinforcing the foundation to advance archiv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N]. China Archives News,2021-08-26(001).)
- [36] 陈忠海,吴雁平,刘东斌. 定原则、建组织、立制度、确规范、划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修订思路及修改建议[J]. 档案学研究,2021(4):55-61. (Chen Z H, Wu Y P, Liu D B. Setting principles, forming organizations, establishing systems, confirming norms, delimiting scopes;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revising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rchiv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Study,2021(4):55-61.)
- [37]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3. (Zhou X H.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val career[M].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5:33.)
- [38] 廖诗评.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J]. 中国法学,2019(6):20-38. (Liao S P.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ble legal system in China: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J]. China Legal Science, 2019(6):20-38.)
- [39] 刘品新. 电子文件立法的实质性转型——以智慧司法创新为视域[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3):189-204. (Liu P X. The substan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take the intelligent innovation as a field of vision[J].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2021,27(3):189-204.)

张 斌 《档案学通讯》总编。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尹 鑫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2021-10-28)